

四库全书 纵横谈

华立著



四库全书纵横谈

华立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库全书纵横谈

华立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插页 4 印张 3.25 字数 5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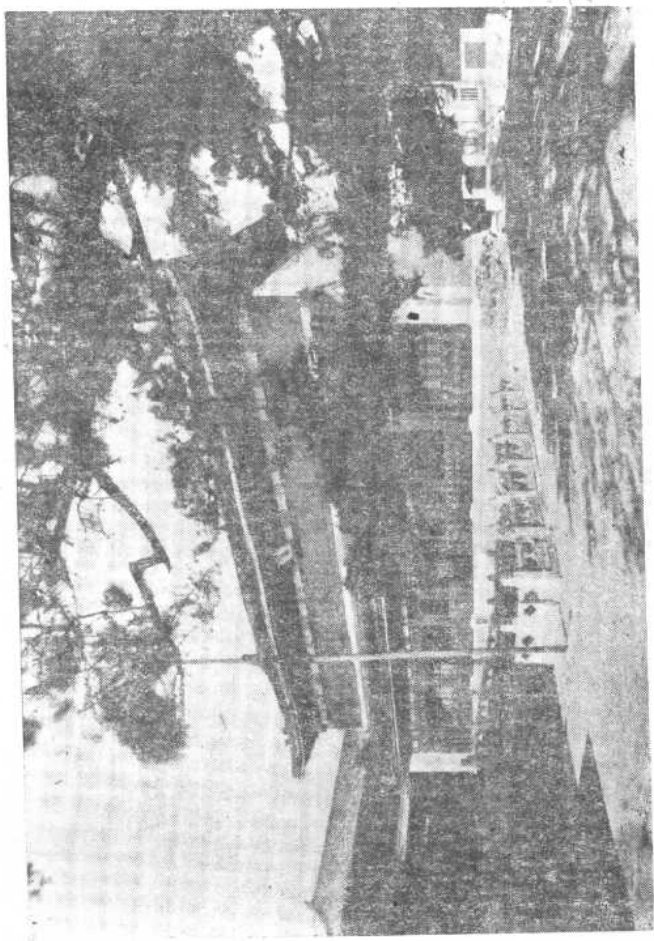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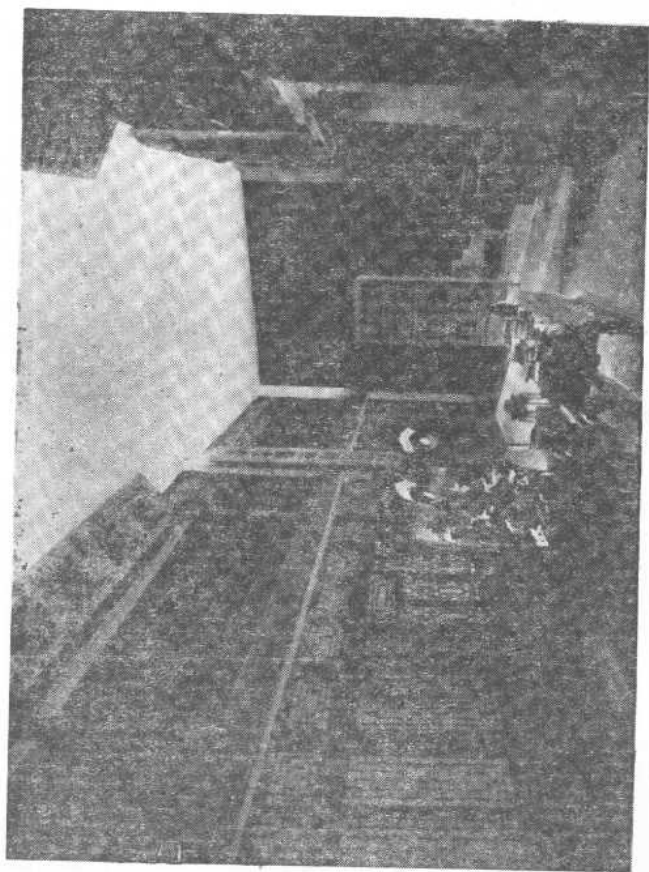
ISBN 7-5325-01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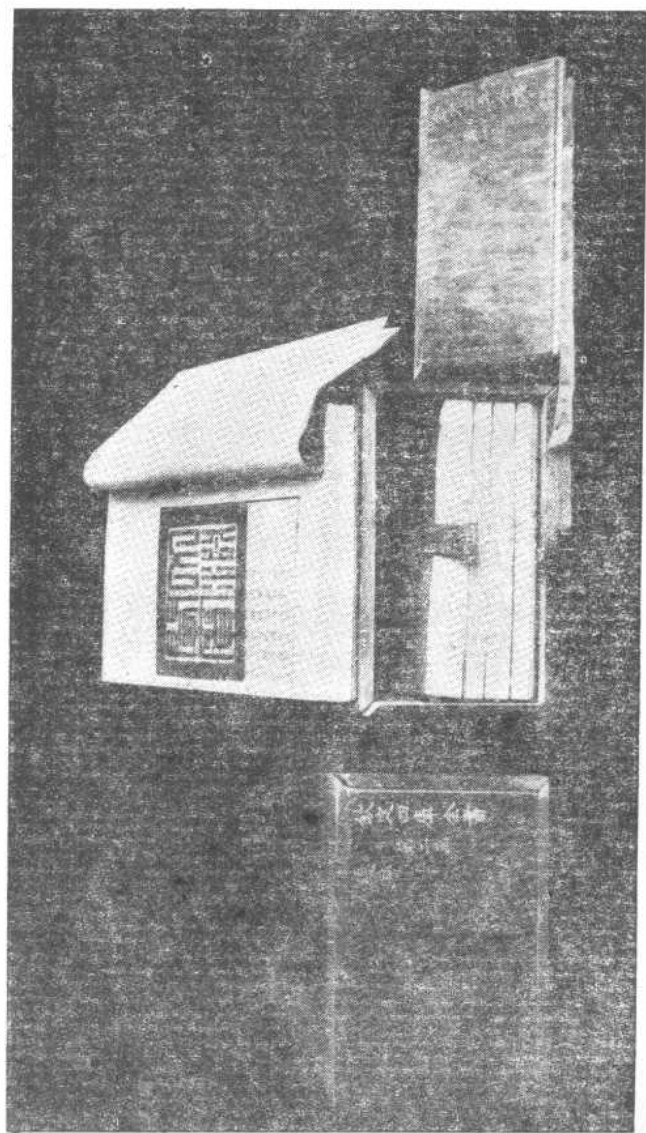
Z·5 定价: 0.89 元

收藏第一份《四库全书》之文渊阁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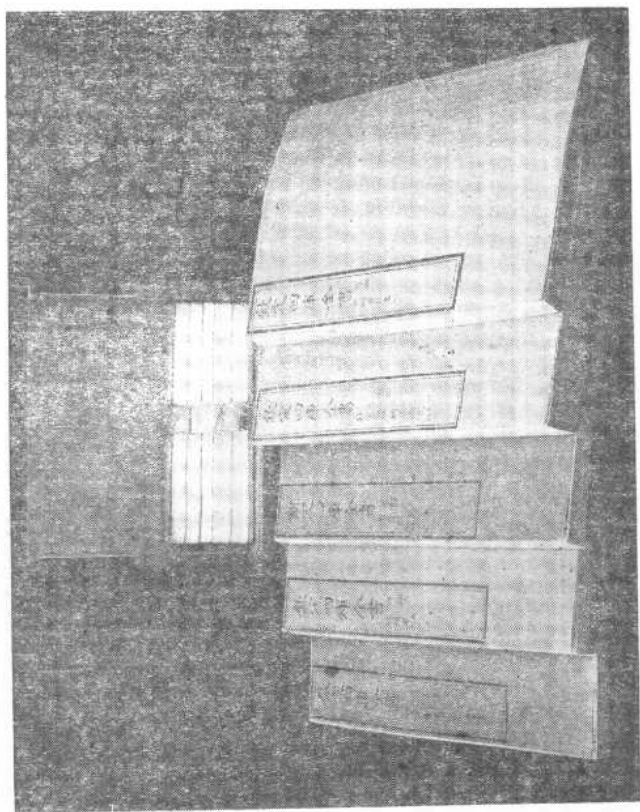


文溯阁内景





《四库全书》书影及书函



目 录

一、举世闻名的大丛书·····	1
二、从“康乾盛世”说到修书缘起·····	5
(一)国力强盛的时代·····	5
(二)标榜文治和“宽严相济”·····	7
(三)《儒藏说》与修丛书·····	11
三、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	15
(一)从征书到开馆·····	15
(二)庞大的纂修机构·····	18
(三)广征集 严审定·····	23
(四)鸿才硕学 荟萃一堂·····	30
四、丰富的内容 严谨的体例·····	37
(一)“四库”名称的由来·····	37
(二)古代图书的大结集·····	39
(三)“知类通方”的《四库全书总目》·····	46
(四)卓有成就的副产品·····	53
五、七阁藏书及其命运·····	53
(一)内廷四阁和江浙三阁·····	58
(二)陆锡熊千里校书·····	64

(三)七部全书的坎坷命运·····	69
六、《四库全书》功过谈·····	77
(一)“千册万帙 汇为一团”·····	77
(二)学术影响 广泛深远·····	83
(三)禁毁书籍 恶果严重·····	89
七、《四库全书》的今天·····	96

一 举世闻名的大丛书

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我国古代典籍宝库的博大。的确，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文化典籍源远流长。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给后世留下了数量宏富，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献典籍，其中一部人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就其编纂形式而言，属于丛书。“丛”也就是“总”，含有聚集与众多的意思。顾名思义，丛书是一种总聚群书的形式。也就是把各种单独流行的著作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再加上一个总的书名。

“丛书”之名在唐代已经出现。唐人陆龟蒙就著有《笠泽丛书》。不过，这部书实际上是他个人的诗文集，与后来的丛书完全不同。作者之所以用“丛书”给它命名，意在自谦，表示所作丛脞细碎，无甚可观。真正的丛书之祖，是南宋宁宗时俞鼎孙与其兄俞经合辑的《儒学警悟》。这部书共七集四十卷，将六种记载宋代制度掌故和人物琐事的著作，汇编为一整部书，从而开创了后世丛书的体制。

丛书和类书都具有广采众书，述而不作的资料汇编性质。不同的是，类书把许多性质相同的材料，从各种不同的书里按句或按段地摘录出来，然后分门别类地综合在一起，编成一部书（也有少数是整部书归入某类的）；丛书则是把书一部部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再按照书籍的性质或古籍部类加以编排。丛书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它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能够较好地保存各书全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完整的资料。一些丛书以《百川学海》、《学海类编》、《百陵学山》命名，就有表示自己是学术的渊海，知识的宝山的意思。另外，有些著作篇幅短小，难以单独出书，只有收入丛书，才能广泛流传，并减少散失的危险。

明清以来，丛书的发展极其迅速，数量、种类洋洋大观。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搜罗颇富，使许多几被湮没的珍贵文献得以流传；卢见曾的《雅雨堂丛书》，所收多为罕见秘本，而且校勘精良；又如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胡珽的《琳琅秘室丛书》，也都颇享盛名。但是无论哪一部，都不能与《四库全书》的内容和篇幅相比，这部包罗万象，精华荟萃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籍丛书之最。

《四库全书》不但在丛书里首屈一指，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封建时代的中央政府，历来有官修群书的传统，宋、明、清几个朝代，都曾修成卷帙浩博的书籍。如宋代有名的“四大书”：《太平御

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明代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含目录六十卷）；清康熙年间开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都让人惊叹。而《四库全书》的纂修规模与内容篇幅，更远在它们之上。为了编纂这部巨型丛书，乾隆皇帝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先后集中四千余人，历时十五年之久，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修书工程。全书共收录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余册（采用解放后重新查点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数字），基本上囊括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主要著作，是古代图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它的卷数和册数，与过去最大的一部官修类书《永乐大典》相比，是后者的三倍多；全书共有九亿九千多万字，比同时代法国狄德罗主编的著名《百科全书》（1751—1772年），多出四十四倍有余。如果把全书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摊开，逐页相接，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书册装成六千多函，单是它们的贮放，就需要一座专门的藏书楼。

在十八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书中包含的丰富典籍，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也是世界性的大宗文化遗产。因此，这部巨书问世之后，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为全世界所瞩目。

自《四库全书》编成以来，英、法、比、日等国的东

西方学者，曾多次要求以重金录副或复制影印，以便分藏。本世纪初，法国的巴黎大学创办中国学院，为了研究中国文化，扩大收藏，很希望借抄其中一部分。后来考虑到书籍珍贵，不便外借，又提议影印，还准备拨款一百八十万法郎，建一座“四库图书馆”。因为中国方面影印之举屡受挫折，未能如愿。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又有一批致力于文化史的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一道研究《四库全书》，将其与在欧洲名重一时的狄德罗《百科全书》相提并论。他们指出，尽管《四库全书》是清朝皇帝“钦定”的文化读本，与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敢于抨击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的《百科全书》在主旨上有原则差别，但就其对古代文化的保存而言，地位不在后者之下，至于规模，更为后者所不及。这样比评是否尽妥，或许不无可议之处，但它与其他事实一样，说明《四库全书》的影响是至为广泛的。直到今天，一些世界上极负声望的大百科全书，如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日本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把《四库全书》的编纂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以专门的条目和段落，介绍给世界各国的读者。

二 从“康乾盛世”说到 修书缘起

（一）国力强盛的时代

清乾隆朝时为什么要纂修一部《四库全书》？这要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说起。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可以说是处在封建末世。但它同以往的许多朝代一样，有过自己堪称隆盛的时代，就当时的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而言，即使与有名的“汉唐盛世”相比，也不显得逊色。这个时期就是清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称“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的出现，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康熙皇帝是它的开创者。康熙初年，经过清初一、二十年的激烈斗争，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已大体确立，但政局尚未最后稳定。康熙皇帝亲政后，接连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清除顽固守旧的鳌拜集团，实行开明政治；削平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吴三桂等分裂势力，维护中央集权；发兵进取台湾，击败发动叛乱的

准噶尔部噶尔丹，平定西藏，阻遏沙俄对我国东北的侵扰等等。这些措施的成功，造成了一个日益安定的政治局面，使整个社会走上休养生息的轨道。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政令，如奖励垦荒，修治黄河，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等等。雍正年间，又进一步实行“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不再向农民征收人丁税。这一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海内久安，民生富庶”的兴盛景象。

乾隆时，清代社会在前两朝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乾隆皇帝大力经营边疆地区，不断翦除分裂割据势力，对天山南北、蒙古诸部、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行有效管理，大大巩固和增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本人也因此而志得意满，夸耀历次用兵是“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当时，清帝国的版图东起库页岛、台湾，西迄巴尔喀什湖、葱岭，北抵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不但幅员广阔，而且民族众多，社会稳定，联系密切。这种空前的“大一统”盛况，既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不曾具有，也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不能比拟的。

就在这一时期，清朝的国力也达到了强盛的顶点。载在国家册籍上的全国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朝末年的最高数字，人口总数空前增长，已突破二亿；工商业日益繁荣，城市相继兴起，生产的规模 and 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甚至超越了明代。财富的大量积

累，使封建国家府库充盈，据记载，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可达三千万两有余，国库贮银常在七、八千万两左右。

社会安定，国家富足，这些都是发展文化事业不可缺少的基本前提。清政府能够在乾隆年间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花费十数年时间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康乾盛世”的时代条件是分不开的。

（二）标榜文治和“宽严相济”

在清代，由朝廷出面组织文人士子编纂书籍的做法，在乾隆朝以前就很盛行。有人做过粗略估算，仅康熙一朝六十年中，由官方举行的修书活动就不下三、四十起，平均一年多就有一起，可想多么频繁。所修书籍，除大量的注经作品，还有不少有用的工具书，如大家熟悉的《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等。特别应当一提的，是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它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开修，雍正初年最后完成，共编成一万卷，份量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

但是，如果以为清朝统治者的修书举动，仅仅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和热衷，那就未免太简单了。因为，在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从来是与政治上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

号称“盛世”的康雍乾时代，又是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一向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用高压加笼络的两手政策对付知识分子，让他们为自己服务。

清朝统治者是决不允许文人士子对自己的专制统治表示任何不满和异议的。清代皇帝经常在读书人或官员的诗文著述里挑剔毛病，凡是认为触犯忌讳的，就给作者加上“心怀不轨”、“图谋叛逆”之类的罪名，大肆杀戮。这种因文字过失而形成的狱案，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字狱”。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之多，株连之广，为历史上前所未见。像康熙朝的“明史案”和“《南山集》狱”，雍正朝的“吕留良案”，都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明史案”发生在康熙初年。浙江富户庄廷铨从邻人手中买到明朝大学士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原书未完，他请人补续明崇祯朝和南明史事，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出版。因为书中写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接受明朝封号，又书写南明年号，被人告发。庄廷铨已死，被开棺戮尸，父兄弟侄问斩，全案株连致死七十多人，连为这部书作序、校阅、刻印甚至售书、买书之人，都未能幸免于难。康熙末年，桐城人戴名世在所著《南山集》里引用同乡方孝标《滇黔纪闻》中的材料，对南明王朝寄以同情，又主张在《明史》中给南明三帝立传，也遭到与庄廷铨相似的惨祸。他本人被杀，方孝标戮尸，两家同族多人受到牵连。雍正六年